

郑新民 著

语言教育新概念

——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bout New Concepts in Language Educa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三期项目建设经费资助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海富通基金”资助出版

语言教育新概念

——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郑新民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教育新概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 郑新民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81110-998-6

I. ①语... II. ①郑... III. ①语言教学—文集 IV. ①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5973 号

语言教育新概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

郑新民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30mm

印 张: 13.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ISBN 978-7-81110-998-6

责任编辑: 赵光莹 钱来娥

装帧设计: 戴 丽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序

郑新民教授作为我国外语界知名学者,在外语教育改革、外语教学、外语课程设置、外语学位论文写作、外语政策与规划等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尤其是在外语教师认知研究方面多有建树。《语言教育新概念:海内外学者访谈录》一书共收录了近5年来郑教授对海内外20位语言学者的访谈录,涵盖了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本体、语用、语音、语言文化、书写系统、语言教学法、语言学习策略、教师教学风格、研究生教育、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教学、教师专长发展、语言教材设计与编写、语言课堂教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话题。

该书共由20篇访谈组成,每篇访谈有人物介绍、提要、访谈文本等内容。郑教授写人物介绍不单只是简单地介绍访谈对象的学术成就,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访谈对象的出身、教养、成长过程、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等加以描述,尤其是通过郑教授本人与他们互动交往的描述,细腻地刻画出这些学者丰富的内心世界,让人读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也因此令本书变得更富有趣味,更具有可读性了。本书提要部分文意清新、文字简约、钩玄提要、层次分明、观点突出、易读易记,读者读完提要之后会情不自禁地想进一步了解访谈内容的细节。访谈内容主要源于郑教授对20位语言学者的专访。在访谈过程中,除个别访谈采

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之外,郑教授主要使用了录音技术,资料经声音转成文字,编成文本之后再交给每一位访谈对象细读确认。访谈内容具有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亮点纷呈、有的放矢、语言丰富、信息量大、通俗易懂等特点,为语言教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话语分析语料。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由语言学学者谈语言教育,尽管他们研究领域不同、研究范式各异,但他们都致力于在教育这一框架上探讨语言学习、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因此,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教育新概念对我国的语言教育发展都富有启迪意义,并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国内篇中 10 位被访对象中有 8 位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这使得这本书极富浓郁的地方特色,加之上海外国语大学“211”特聘教授顾力行先生(Steve Kulich)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并在上外教授跨文化教学许久,他将国际视野与中国语言教育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引人入胜,令人掩卷遐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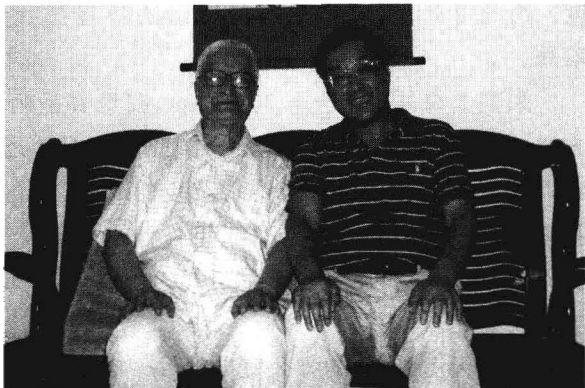
2011 年春

目 录

序(曹德明).....	1
1. 章振邦 我在上外英语系从事教法改革和语法新编	1
2. 王德春 语言学研究生“四位一体”培养模式	10
3. 何兆熊 我的语言学习观:零起点让人更努力	25
4. 虞建华 语言教育应就人的终身发展而言	39
5. 许余龙 语言教育中的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	49
6. 金立鑫 语言学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	66
7. 陈坚林 我的科研观和研究生培养观	82
8. 顾力行 跨文化交际教学应该让人得到发展	98
9. 张后尘 学术杂志是教学与研究的桥梁	111
10. 蔡基刚 博士生教育: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	120
11. Phyllis Chew 新加坡英语教学改革窥探	128
12. Vivian Cook 书写系统:语言习得中不可或缺的研究	136
13. Rod Ellis 语言是交流工具还是实体	143
14. Donald Freeman 语言教学改革关键要靠教师	150

15. William Littlewood 用情境化思维探究语言课堂教学	156
16. Suhanthie Motha 美国应用语言学博士论文研究新走向	166
17. David Nunan 文化可教否? 应该教谁的文化?	173
18. John Ohala 语音感知是历时变化的决定因素	182
19. Jack Richards 反思应成为语言教师的自觉行为	191
20. Jef Verschueren 语用学的多维视角:认知、社会与文化	200
后记	209

我在上外英语系^①从事教法改革和语法新编



【人物：章振邦】

章振邦，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章教授一直在从事英语教学语法编写体系的改革工作，本着“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原则，汲取当代英语语言学研究的某些成果，并结合我国英语教学正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高等学校。学校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四部为基础，于1949年12月正式成立，校名为上海俄文学校。1950年，学校增设英语班，更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9月，学校改名为上海俄文专修学校；11月，又改名为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制为3年。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该校增设英、德、法语专业，学制定为4年，正式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199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学校正式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章振邦教授于1956年调入当时称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工作。

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主编和编著了《新编英语语法》两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新编英语语法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通用英语语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新编高中英语语法和词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其中,《新编英语语法》两卷本曾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于1998年获上海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2004年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并先后于2003年和2008年列入“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笔者使用 google 搜索引擎来搜索“章振邦”,用时 0.10 秒,获得约 45,500 条结果,显示的关键词主要是“章振邦”、“英语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等,这多少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章教授在编写我国英语语法教材方面所享有的知名度。由此可见,他所编写的英语语法教程被我国英语学习者广泛使用,经久不衰。

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之后,我想着手调研上外的外语教学传统与传承方式。听同事们说,章教授虽年事已高,但身体还算硬朗,精神矍铄,时不时还会到上外来走走。我动了采访章教授的心思,但内心又唯恐老人推托不肯接受。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在2010年暮春的一个下午给章教授打了个电话,先作自我介绍,然后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我的意图。没想到章教授用十分爽朗的笑声答应了我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我的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话筒那头是章教授的声音。他说他上午要到上外门诊部取药,想利用这个机会顺道来看看我。我当时真的感觉很不安,一个大学者,一个年逾九旬的长者,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我如何能担当得起啊!章教授还是来了!要不是他拄着拐棍,要不是他脸上长有少许的老年斑,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已是92岁高龄的老寿星了。我起身让座,沏茶,放好录音笔,等着老人打开话匣子。章教授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记忆力好,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表述准确。

章教授祖籍安徽,1918年生于北京,6岁开始读私塾。他的父亲是铁路员工,在北京火车站当过列车长、小站的站长。由于他的父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生遭受过很多挫折。当时的铁路属于洋务,铁路上的段长、站长都是英国人,打个报告都要请人用英文代书,哪怕是写一张请假条,也要花两块大洋,稍微长一些的文书就要花五块大洋,再长一点的则要花十块大洋。所以,他的父亲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在章教授还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把英语学好,不然以后的人生旅途将会非常艰难。

于是,章教授的父亲就请教师来家里教他学英文,虽然那仅仅是一点点启蒙英文教育,然而就是那点英文“底子”,对他后来的中学英语学习起到了“铺路”的作用。1940年,章教授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研习英国文学。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章教授把学习重点放在文学上,这是因为当时搞语言教学不如搞文学工作。章教授回忆说,那时候的武汉大学外文系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的教育。学校除了开设外国文学课之外,还开设了“西洋通史”、“中国通史”、“文学概论”、“逻辑学”、“经济学”、“哲学”等课程,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章教授的老师是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当教务长和外文系主任。朱光潜先生经常对他说,学校里所开设的课程都仅仅是入门的知识,光靠一个学期、36节课时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学生必须要有自己的计划,开展大量的阅读,努力钻研,才能学有所成。章教授记得每两周要见朱先生一次面,先生都会详细地询问他都读了哪些书,都有哪些思考等。章教授说,要是他在两周里没有读什么书,他是不敢去见朱先生的。章教授说,武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虽然外语口语能力不及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但是在其他方面发展的潜力和后劲都要远比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该归功于武大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

章教授194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外文系助教,教基础英文,并结合文学作品系统研习欧洲历史。1946年,章教授任国立安徽大学外文系讲师,教大一英语和世界通史。1948年底,他前往解放区参加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后,章教授仍回安徽大学工作,由于当时无英语可教,他只好改教了几年政治课。195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成立,创办英、德、法三个专业,章教授奉调“归队”,重操英语教学之旧业。之后,他一直在上外英语系从事教学工作,至1987年离休,但他离而未休,仍在做编写工作,直到现在。

【提 要】

章振邦教授的访谈为我们勾勒出他长期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两幅立体画面,一是他长期努力不懈地去探寻一种适合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教学方法,曾与上外英语系老师们一起致力于以“加强外语基本功训练”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法改革工作,并根据老师们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名为“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上外英语系基础阶段的英语教学质量;二是他与英语系老师们一起,努力探索英语语法体系的改革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部崭新的教学语法系统,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访 谈】

问:章教授,您这么大的岁数了,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不敢当啊。原本说好的,该我去拜访您的。

答:你给我打电话,当中谈了你要研究上外的教学传统的想法,我很赞成,也很想跟你见个面,大家谈谈。不过呢,我所反映的情况是局部的,因为我在上外虽然工作了50多年,但也只局限于英语专业、英语系(当时我是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做了一些事,也跟着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我讲的都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

问:大学毕业后,您一直在大学教书吗?

答:我从武大外文系毕业之后留校当助教,教基础英文。后来,我在安徽大学当讲师,也还教基础英文。新中国刚成立时,我改教政治课,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级把我调到北京去培训,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学虽仅触及皮毛,但对我一生的教学与科研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问:您到上外之后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在上外主要做了两件事。“文革”以前,我主要是同大家一起搞教学方法的改革,当时的教改工作是以加强英语基本功训练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英语专业一开始就受到1958年“大跃进”^①的冲击。所谓“大跃进”就是提倡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高速度地发展。那么上海外国语学院是怎么搞“高速度”的呢?经过领导层一番策划,就把我院的“高速度”定位为两年的学生外语能力赶上四年的外语能力,四年的外语能力达到七年的外语能力,即所谓的“两赶四,四

①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赶七”。方针既定,全院雷厉风行,到了适当时候,俄语系首先宣布“两年已经赶上四年了”,接着英语专业也宣布赶上了。其实,我们英语专业还没有四年级,更没有七年级,最高只有三年级,所以都是在说空话,讲大话,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当时有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人到我院来“取经”,发现我们三年级学生在课堂上用英语回答老师提问,非常流利。其实那都是在作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事实上,我们是在拔苗助长,牺牲了外语基本功训练,违反了外语教学的规律,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后来,全国都在批判“浮夸风”,我院新领导要求我们调查一下三年级的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英语专业三年级质量做了过细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我是调查组的一个成员,最后由我执笔写成了《英三教学质量调查报告》,上报到院党委。报告一出来,大家深感违反外语教学规律的严重后果,所以后来上外搞教改首先以狠抓基本功训练为突破口。

问:您觉着这个教学改革是建校以来比较有规模和系统的教学改革吗?

答:是的。在1961、1962年以后,我们大力抓英语基本功训练,提高了教学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学校各方面都蒸蒸日上,不久便由一所普通的外语学院成为部属的重点大学。

问:那时候没有全国统考,专四、八级英语统考,教育部也无法通过测试评价的方式来衡量学生质量的高低。您觉着当时上外的质量改进都有哪些办法?

答:那时大学招生有统考,而且统考还是很严格的。上外严把招生关,在教学方法上严抓基本功训练,狠抓升、留级制度,在教材的编写上也大加改进。在了1964年和1965年间,我们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试行了“听说领先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65年6月,高教部在北京召开了英语教学座谈会,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的负责人以及一些院校领导都参加了此次会议。我们学校的王季愚院长带我去参加了会议,让我在会上把我们“听说领先法”的总结向大家做了汇报,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高教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后来在全国推广,对推动英语教学法的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到了“文革”时,这个方法又被否定了。但事实上,当时这个改革不仅改革了英语教学法,也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来编写适合于听说训练的英语教材,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如何调整英语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

“文革”以前,尽管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阻力,应该说我们的改革还是成功的。“文革”后,百废待兴,英语教学恢复了,我们当时还是传承了这一套方法,不断地改进它。我们的教材、教学方法也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

问:从您的叙述中了解到,“大跃进”之后,拨乱反正,教育部肯定了上外的教学改革工作,要是没有“文革”,这种改革就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这说明“文革”对教学改革有了很大的破坏性。“文革”之后,上外的课程设置还是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吗?1978年恢复高考后,这个教学法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吗?

答:是的,而且做得更好了,考虑得更周到了。“文革”以后,我们的教法搞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这种方法在兄弟院校试行时一度走了极端,一切都是为了交际,不要语法了,连语言结构的训练都不做了,奉行所谓“流利性重于准确性”(fluency over accuracy)的原则。一切只是为了交际,能说就行了。

当时我们到广州开会,也看人家的表演,看起来就感觉到英语教学不能只顾流利,语法结构上的错误不能不管。如果错误变成了习惯,那不成了教“洋泾浜”英语嘛。所以交际法传到上外后,我们主张在提高交际能力的同时,还要注重语言结构的训练。李观仪教授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这一教材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所以,至今这套英语教程依然还很有生命力。

问:这是不是表明上外的外语教学传统就是在吸收新事物的同时,也注重消化和转化,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答:我刚才所讲的“听说领先法”是强调加强听说训练,但也不是简单地加强听说训练就完了,我们还注意到要处理好听说和读写的关系。加强听说训练,并不是不要读写,听说能力的加强能带动读写,读写能力的提高也能促进听说能力的提高,我们是动态地处理它们的关系。并且,不同的年级着重点也不同。低年级以听说为主,带动读写;高年级读写能力要大大地加强,以此来促进听说能力,使之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

上外的一套外语教学法经验是比较稳健的,它不走极端,所以容易实施,容易为兄弟院校所接受。过去关于外语教学法的讨论往往把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语言结构的训练对立起来,以至一讲到“交际法”,就否认了语法教学的必要性。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偏废哪一方,只是不能过分强调语言结构训练的重要性,而应以培养交际能力作为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我们是在汉语的环境里给中国成年人教外语,外语能力的落后、外语交际能力的薄弱,都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外语,特别是在基础阶段,对听说训练和培养外语交际能力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只是这种教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一定外语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搞成“洋泾浜”英语。

问:您所说的是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学习者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外语学习环境,我们既要营造语言学习的氛围,又要考虑语言教学的规律。

答: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给成年人教英语,怎么教?听、说、读、写、译都要照顾到,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在不同的教学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问:所言极是,您非常形象地把上外的教学模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您在上外做的第二件事呢?

答: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主持编写了一套新型的英语语法书。“文革”以后,百废待兴。上海译文出版社要我们新编一部英语语法书。当时人心思变,对已有的语法书认为应该有所改进。怎么改?我们是从认真研讨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Quirk 和 Leech 等人所著《当代英语语法》(1973 年)开始的。在这部语法著作中包含了许多不同于传统语法书的亮点,比如传统的英语语法书说英语有 12 个、14 个、16 个动词时态,而新的语法书说英语只有“现在时”和“过去时”两个时态,没有“将来时”和“过去将来时”;又如,传统的语法书把英语的“虚拟语气”搞得非常复杂,而新的语法书却把“虚拟语气”大大地简化了。诸如此类的新观点、新提法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的道理,这就需要我们中国人认真研讨,决定取舍。我们既不盲目地跟着洋人后面转,也不固步自封,对新事物视而不见。

问:你们在新编语法的工作中如何对待现代各种语言学流派?

答:我们的原则是“兼收并蓄,洋为中用”。说老实话,我们不是搞语言学理论的,对于当代许多语言学流派,我们是门外汉,但是对于当代语言学某些有关外语教学的新论断、新成果,我们是虚心学习、认真讨论的。对于这些新论断、新成果,我们是择其能为我用者,用之;其不能为我所用者,或因为我们还未学懂,暂时还不能为我所用者,则暂时搁置之。我们对于这些新东西的取舍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能为中国人学英语服务,是否有利于我们的英语教学。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随时检来就能为我所用的,它必须能够纳入我们的新编体系,变为中国的东西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这就是所谓的“洋为中用”。比如,把英语语法结构描写为“词素、词、词组、分句、句子”五个层次之说原先也是引自 Quirk 和 Leech 等所著《当代英语语法》(1973 年),但是把语法层次和语篇层次连为一体,绘出一幅英语语言结构层次性的完整图画的工作,却是我们干的。当然这在我国并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 1000 多年前,我国的文艺批评大师刘勰就已在《文心雕龙》中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

问:你们在新编语法的研编中恐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吧?是否也遇到一定的阻力?

答:阻力是有的,但不是来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是来自同行中的某些习惯势力。我们的改革对象是英语教学语法,而广大英语老师长期以来用的是传

统的语法系统,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力量,要使老师们完全接受新的提法,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关键是要真正讲清道理,使人在认识上真正接受。有鉴于此,我们对于每一项重大改革都不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写文章、作报告、开讨论会。在讨论会上,争论非常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在讨论是否应该引进“限定词”问题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坚决反对。但是不管反对意见如何尖锐,我们总是坚持说理的原则,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绝不简单地地下结论。这样经过正、反两方意见的充分交锋,然后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待“阻力”的态度。阻力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阻力,另一种是非善意的阻力。以上所说的都是善意的阻力:有些老师教了几十年英语,用的都是传统的语法系统,现在忽然要改变说法,一时思想上转不过来,惟恐这样一改不利于我们的英语教学,因而提出不同意见,这完全是一种善意的行为。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非善意的阻力,就有那么一些人,他自己不干,也不让人家干;你干了,他就在背地里讲怪话,放冷箭,甚至使出小伎俩,暗地拆台。对于这种阻力,我们只能置之不理,或者据理力争。

问:您觉得《新编英语语法》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新编英语语法》系列的体系核心就是贯彻了层次分析法。新语法全书的布局就是按照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由语法层次到语篇层次,逐步展开的。我们贯彻的是层次分析法,于是我们在词组结构和分句结构上大做文章,并借此将语法内容引向深入。根据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我们对英语的词类划分做了适当的调整。首先是把包括冠词在内的“限定词”确定为一个词类,从而区别了限定词与形容词在构成名词词组中的作用。关于词类划分的另一重大调整是在动词方面,按照新体系,英语的动词分为两大类:主动词和助动词。前者属于开放词类,后者属于封闭词类;同时又扩大了助动词的类别,大大丰富了助动词的内涵。此外,《新编英语语法》还注意处理好语法和词汇的关系、语法和词调的关系、语法和语篇的关系,从而将语法、修辞、写作连为一体,这就提高了语法教学的适用性。

问:我今年50出头了。我22岁的时候,学语法用的是张道真的书,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使用的语法教材很不错,但是您的书出来后,我们也拜读了。一比较,您的书有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给我们一种比较新的感觉。这套教程已经出到第几版了?是否版版都有改进?

答:这套教程已经出到第5版,且版版都有所改进。当然,大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变,改变的都是细节方面。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大,许多老师在教学中发现

了问题便向我们提出来,我们非常重视老师们的意见,几乎每封来信我都亲自答复。有错马上就改,绝不文过饰非。我们认为,老师们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我们提出,是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非常难得,它能帮助我们少犯错误,不断改进。这就是为什么《新编英语语法》有很强的生命力,几十年长盛不衰的道理吧。

语言学研究生“四位一体”培养模式



【人物：王德春】

王德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修辞学会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著作有《现代语言学研究》、《词汇学研究》、《修辞学探索》、《语言学教程》、《语体略论》、《现代修辞学》、《语言学概论》、《社会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学通论》、《多角度研究语言》、《语体学》、《汉英谚语文化》等；主编的论著、词典有《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大学修辞学》、《修辞学词典》、《汉语国俗词典》、《汉语修辞词典》、《英语习惯搭配词典》、《新惯用语词典》、Project English、《新世纪对外汉语系列教材》等；有译著多部，主编期刊、丛刊、论文集、丛书多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先后创立国俗语义学、言语环境学、信息修辞学、建构语言学、微观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建构主义外语教学论等新学科。